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

· 论 集 ·



孙中山：愈挫愈奋的 伟大先行者

张 磊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

· 论 集 ·

孙中山：愈挫愈奋的 伟大先行者

张 磊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策 划：陈海烈

卢 权

责任编辑：陈海烈

封面设计：迪 赛

责任技编：孔洁贞

责任校对：顾锡麟

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

张 磊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中印刷公司印刷

(厂址：佛山普澜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75印张 2插页 440,000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218-02272-3/K·511

定价：(精) 48.00元 (平) 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序言

几年前，当孙中山基金会在广东成立时，便曾有编辑出版丛书的设想。如今，经过本会同人的努力，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下，本丛书终于在孙中山先生诞辰 130 周年前夕开始和大家见面了，这是值得高兴的。

推动孙中山学术研究，是孙中山基金会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本会章程所明确规定的。因此，出版有关孙中山的学术研究成果，就将构成“孙中山基金会丛书”的主要内容。

大家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优秀的代表之一。100 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孙中山先生早年赴夏威夷、香港求学，在澳门、广州行医。他目睹祖国在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下，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对外丧失主权独立，对内没有民主自由，国家衰弱落后，人民贫穷困苦，旅外华侨蒙受歧视迫害，而立下救国救民的弘愿。他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组织民主革命团体，创立三民主义学说，奔波于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奔波于日本、越南、马来半岛、暹罗（今泰国）、美国、加拿大及西欧各国，广泛团结国内各

阶层人民、各地侨胞和联络外国友人，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1912年倾覆清朝统治，废除封建帝制，创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国家。随后，他同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大小军阀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制订出复兴民族经济的建设蓝图。他热情支援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要求消除国际不平等关系，主张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的大同社会。在他晚年，又积极联合中国共产党和扶助工农运动，为推进国民革命和实现国家统一而工作到最后一息。一言以蔽之，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统一和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在长期斗争中对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创造性探讨，也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遗产。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还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祖国充满热爱，对振兴中华倾注巨大热情，又深切关心世界人类的共同进步。他襟怀豁达，对民众及自己的部属谦和仁厚，并善于团结国际友人。他富有开拓精神，勇于进取，百折不挠，对正义事业坚贞不移。他富有献身精神，为革命工作鞠躬尽瘁，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不谋私利。他善于顺应世界潮流与人群之需要，研究历史与现实，好学不倦，思想上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凡此种种，莫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性格和崇高精神。

正因如此，我们因中华民族拥有孙中山先生这样一位杰出人物而感到自豪，一直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中华民族过去曾为人类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今日也正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工作，致力于建设和统一祖国，并希冀在21世纪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加强孙中山学术研究，对他所留下的思想遗产给予科学总结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进一步弘扬他

那热爱祖国、振兴中华、关心人类共同进步的伟大精神，这对于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它的作用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他的思想和实践活动，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条件，与当时的许多历史现象和历史因素密切相关。所以，研究孙中山就不得不同时研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研究与他有关的各种事件、人物、派别、阶级、社会思潮、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国际关系等等。唯有这样，才能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表现及其作用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由于时代条件所限制，他的思想和实践活动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并不奇怪。历史人物的成就与不足都必须置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并给予科学的说明。那种脱离历史实际，对孙中山先生或则故意拔高和溢美，或则妄加菲薄和苛求，都是不恰当的。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所出版的孙中山学术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集、资料、译作四个系列，并分别成立编委会，在孙中山基金会统一领导下负责组织稿件和编审工作。为利于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要求出版的论著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倡潜心钻研和认真探索，提倡勇于创新 and 自由争鸣；而专题资料汇编，则要求内容完整和史料价值较高；同时，准备陆续选择若干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外文著作或珍贵的外文资料。除此之外，本丛书还拟根据今后的需要，出版其他内容的书籍。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将能够长期出版下去。

本丛书由孙中山基金会负担出版费用。在这里，谨向海内外热心提供赞助的朋友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孙中山基金会会长 欧初

1996年8月于广州

深化与拓展孙中山研究（代序）

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已 70 年，中国和世界在这期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的光辉形象并未在时光流逝中淡化。他在炎黄子孙中间受到普遍的尊重，而且获得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的人们的广泛认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理论与实践的终极目标是要挣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世界大同”则为其最高理想，因而体现了人类企求的共同进步趋向；他的愈挫愈奋的坚毅精神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实是风范长存，堪为楷模。

孙中山研究成为“显学”，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从 70 年代末期开始，孙中山研究在祖国大陆进入空前繁荣阶段。约 500 万言的《孙中山全集》问世，大量的专著、论文、资料汇编和图录相继出版，两间孙中山研究所在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建立，近 10 个孙中山研究会组成。同时，举行了多次以孙中山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特别是海峡两岸学者日益频繁的

交流，更有力地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事实证明，孙中山的政治生涯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而他在推动近代化的过程中留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后继者实现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甚有裨益。

当前，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这门“显学”能否和如何深化与拓展呢？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研究已经“大体完成”，难有更多的文章可作。有位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譬之为英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断言不可能再有进展。另一种意见截然相反，认为孙中山研究决不应当停步，满足于目前的成果是没有根据的，迄今尚未见到一部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相称的优秀传记。后一种意见显然符合实际情况和具有积极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奋进。

(一)

改善史学研究——孙中山研究的方法论，是关乎深化和拓展的关键。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早应提上议事日程。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笼统地采取排外态度，把西方的许多学科、学派不加分析地斥为“唯心主义”、“伪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则糅杂了教条式的理解和错误的附加。就史学领域而言，方法论的缺陷和弊端显而易见：片面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分析的方法绝对化；抛开了历史主义，一味从当前的“政治需要”去评价历史人物（溢恶和溢美）；囿于单一的归纳法和比较法；只注重对于人物和事件作定性说明和论证；满足于繁琐的考据和史

料的排比，忽视史学研究的多层次性……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势难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必须适应实际生活的进程，迎接改革与开放的潮流，关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以丰富和发展方法论。这对包括孙中山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显然会起到促进作用。

一元为主的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可取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应是主元，因为它能使研究者把握事物的全貌、本质和主流，深入地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正确评价个人与群众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作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优势。当然，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借助当代科学发展的成果对立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不断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的科学。况且，不同学科还有着属于自身领域和层次的方法论。所以，在主元的基础上的多元化的方法论才是可取的。

从孙中山研究的方法论看来，过去存在着简单化的、教条式的和极左的倾向。当然，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符合实际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可是，偏颇确是存在的。例如：离开了历史条件去苛求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用马克思主义与之对比，因而贬低了他的意义，有悖于历史的真实（相反的溢美倾向，近年来也有所反映）；侧重于他的政治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忽略了其他方面——文化思想等等——的探索，而在有关他的政治理论的研究中，政体方面又往往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孤立地去论述他的活动，对他所隶属的社会阶级和所凭借的社会舞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往往浅尝辄止，甚至语焉不详；缺乏比较性的分析，显示不出他对先驱者的继承和

独创，也难以把握他与同代的革命党人相较的优长和特点；单纯地将他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忽略了他的复杂的心态和性格……因此，引入社会学的、文化学的、心理学的和比较方法、计量方法、系统方法等等，有助于深入和全面地研究孙中山，从而更为趋近历史真实地展示这位伟大人物的风貌。

(二)

把孙中山与同他的有关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联系起来考察，是深化与拓展孙中山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

毫无疑问，杰出的人物总是一定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的代表。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既反映了这种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又促进了这种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孙中山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轫时期。他又是一位开放型的政治活动家，长期在国外学习和活动，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和美洲，堪称为世界性的人物。因此，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就是十分复杂的——其范围涉及国内外，其内涵则是多元的。

当然，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代表人物，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正如列宁所指出：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孙中山从西方借取了革命思想。因此，必须进一步探究他与“西学”的关系——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学说领域中接受了那些东西？他又拒斥了什么观念？他如何把能够接受的“西学”熔铸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去？他经由什么渠道接触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十八世纪以来的哪些“西学”流派和学说对他影响最大？……这些问题大多已有著作论及，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

孙中山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也是密切的，他甚至把他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他很早就接触和同情社会主义，并且曾经对社会主义思潮及其流派作过专门的评述。所以，必须进一步探究他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和列宁本人）的理解和态度？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态度？他对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解和态度？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和态度？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态度？他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异同？……近年来的不少论文阐述了孙中山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似乎对他的认识和接受水平略有拔高。事实上，他没有也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事实在他关于社会主义各流派的述评中充分显示出来，直到他的晚年也未曾发生根本改变。读一读关于三民主义演讲中的民生主义部分，一切就十分清楚（他认为民生主义包涵了社会主义）。至于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则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印记。孙中山与同代的许多先驱者一样，在向西方学习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溃疡，于是便希望实行免除资本主义弊病的资本主义，由是产生了主观社会主义的构想和“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因之，他接受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若干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学说——如亨利·乔治——受到他的称道，并将其中的部分内容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此外，他还把资产阶级的国有化误为社会主义。应当承认，孙中山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但在探索和研讨中似乎不宜否认他始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也不宜夸大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同。

孙中山与中国的传统思潮的关系，无疑是颇有意味的课题。除了少数抱有政治偏见的“信徒”曾把孙中山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认为他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孟之道的集大成者。研究者们大多确认他反对封建主义，是传统观念的离异者，虽然，他对中世纪的某些思想因素有所借用。孙中山是位接受欧洲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在同代人中以较为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闻名当世。近几年来，一些深入研讨这个课题的文章又指出孙中山后来的“复归”，认为他越来越意识到西方文化的不足和弊端，乃从孔孟的著述中寻求补救，不仅较多地援引儒家经籍，并且予以高度的评价。另一些论者则持异议，以为并不存在着“复归”——孙中山受儒学的浸染不深（例如，17岁到香港读书时看中文报刊都很困难，直到晚年对“修身”的理解都是粗浅的），而他对儒学中某些观念的阐释则赋予了民主主义的内容。要之，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做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孙中山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社会运动是极其关注的。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评论，采取了分析和扬弃的态度。以太平天国为高峰的农民运动给他以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从反满、以暴力手段推翻封建苛政等方面加以赞扬，并曾在青年时代一度以“洪秀全第二”自况，但却坚决摒弃其皇权主义。义和团的反侵略英勇斗争为他所肯定，笼统排外倾向则受到批判。洋务运动曾经吸引过他的注意力，而它的局限和浅薄旋即被他察知。维新运动对他的思想和实践产生过明显的影响，向西方学习和实施资本主义化的变革符合他的意愿，可是他逾越了君主立宪的藩篱，并对一些代表人物后来的保皇主张大加抨击。从以上的顺序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论断：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各种社会运动都有密切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颇有待于深入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同孙中山的关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还在1905年，孙中山就在布鲁塞尔访问过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但没有建立密切的关系，因为后者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是冷漠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他带来了大希望，他对列宁和苏维埃国家表示了尊敬的情谊和学习的愿望。国际无产阶级给予孙中山以思想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而“联俄”则成为他晚年的重要战略决策。至于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始于后者诞生之初，这个似乎是顺畅的实现过程实际上蕴涵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内以及两党之间，甚至延伸到国际范围。孙中山的“联共”决策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但在1927年被国民党右派所破坏。这场悲剧性的事变，自有其深刻的内因。孙中山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是他毕生政治活动——特别是在后期——的重要契机。应当尽力发掘和整理资料，并深入进行分析和评价。

(三)

孙中山无疑是一个巨人。

他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当然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他不只一次地环行世界，足迹遍及亚、欧、美各地。他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民主政纲，又糅杂了美好的梦幻。他思考“知”与“行”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又亲历戎行指挥作战。他制订了宏伟的实业计划，个人却常常身无分文。他在湍急的历史潮流前从不驻足，而是与时俱进……他的活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对他的

研究应当和必需反映这个特点。

在思想领域研究中，关于各个课题的专著和文章确是为数不少。但是，研究过程却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在是否以三民主义为框架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从总体方面考察，有必要深究他的思想的多元的源头，剖析他的思想的熔铸过程，阐明他的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由于独立和民主是构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课题，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以之为中心。从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到反帝，他的认识历程是曲折的。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准则，至少也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易。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他的关于政体的擘划常被忽视或贬低。革命程序论、政党与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全民政治论、地方自治论和五权宪法论，都亟待深入地、实事求是地研究。甚至像《民权初步》这种被孙中山自称为“味同嚼蜡”的关于会议规则的著作，也应从反对封建主义和民主启蒙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对于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同样有再认识的必要。他对现代化的、社会化的、商品化的大生产的充分肯定，显然是民生主义思想的精粹。他没有民粹派怀抱的伤感和恐惧，虽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溃瘍和托拉斯的专横。至于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构想，也未始不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案，不宜一概目为空想，予以简单否定（台湾的土地改革，可资参考）。此外，他对开放和引进的主张及实业化的计划也有着许多科学性的成分。关于孙中山的文化思想研究比较薄弱，近年来的有关论文较多。不过，关于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的关系，关于引进西方文化的若干问题（中西文化的接合部，西化与国情等等），关于对传统文化的离异和“复归”问题，尚需深入研讨。孙中山在军事、外交、教育、科技等领域中的观念，也研究得不够充分。

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孙中山的实践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他是政党的领袖（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以迄中国国民党），在这方面的活动达三十年，内容丰富复杂，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他是一名外交家，与世界上不同类型的许多国家（从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和知名人士有过接触和交往，而他同一个国家的关系（如同日本和美国），都可成为重要的专题研究。他还毕生从事革命的“战争事业”，军事活动与政治活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又是一名建设者，祖国的富强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不仅提出宏伟的构想，而且亲自考察和勘测……

对于巨人的研究，应当多方面、多层次地予以全方位的探究。

（四）

在孙中山的长期政治生涯中，存在着一些十分重要的、带有相对体系性的课题。对它们进行研究，是深化和拓展的需求。

孙中山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亟需进一步研究。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领袖，而他所代表的这个阶级的不同层次在不同时期对他的态度到底如何？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阶段的动向，更值得认真研究。孙中山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有待深入探讨——他对劳动人民的观念有没有逾越民主主义的范围，他的后期观念与前期观念有否质的差异，他在这个课题上的战略考虑和理论认识的剪刀差。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可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近代中国军阀的前身——到晚年的

所谓孙、段、张“三角同盟”，他的认识和实践异常错综复杂。我曾先睹了一部即将出版的专门研究这个课题的专著，对于了解孙中山的政治生活深有启发。

还有一些较为集中的专题，近年来开始为研究者们所关注。例如，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孙中山与三大政策，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由于资料的增多和僵化束缚的消除，这类过去处于薄弱状况的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然，再接再厉还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所述，不过荦荦大端。挂一漏百，在所难免，偏颇错误之处更是不少。我的唯一愿望是把孙中山研究推向新阶段，所以才不揣浅陋地略陈管见。

（原载《文史哲》1995年第1期）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论集系列编委会

主 编：刘望龄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庆忠 沈茂骏

莫世祥 桑 兵